

#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与 劳动收入比重变动<sup>\*</sup>

□ 徐 圣 黄先海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传统部门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以“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为分界,具体表现为:在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结构转型引起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而在二元经济的第二阶段,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n型曲线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52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万个跨国面板数据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转移效应几乎为零,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较为复杂,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转移效应为负。

**关键词** 二元经济转型 劳动转移效应 劳动收入比重

作者徐圣,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杭州 310023)黄先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7)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在各个产业中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Kaldor 事实”受到了实证观察的挑战,这一现象使得该领域又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目前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大环境下,因此研究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术界在研究经济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方面具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认为C-D生产函数使得要素收入分配份额保持恒定,但是该微观结论推广至宏观领域结论却不再如此明显,Solow (1958)用构建的产业分解法,研究发现无论是产业层面还是分行业层面,劳动收入比重都呈现相

对稳定的状态。Solow的产业分解法不仅受国外学者的认可(Young, 2010),还被国内学者广泛采用。国内学者根据Solow的分解方法既分析了产业层面的劳动收入比重(白重恩等,2009a;罗长远等,2009a;范从来等,2012),也分析了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比重(翁杰、周礼,2010)。上述研究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不仅产业结构变动会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产业内部也有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明显迹象(罗长远、张军,2009b;白重恩、钱震杰,2009a; Bai and Qian, 2010)。这一发现激发了学者们进一步思考,什么因素导致了产业间与产业内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动效应均为负?翁杰(2011)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结构变动的框架下,

<sup>\*</sup>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和要素收入分配变动:理论分析和动态模拟”(课题编号:712732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课题“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机理研究——基于要素市场的视角”(课题编号:13YJC790168)、2013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浙江省城市化进程中的要素收入效应: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3Z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这一问题做了理论解释。但在对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发现,劳动收入比重并没有表现出类似宏观经济层面的下降的趋势(方军雄,2011)。这说明劳动收入分配的结构化分析能揭示一些整体性分析可能忽略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的最大的经济结构变迁是二元经济的转型,基于这一思想,本文以刘易斯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为分界点,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的要素转移模型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各个阶段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同时利用跨国的大面板数据寻求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经验证据。

### 一、理论模型

中国目前并存着以农业部门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传统部门主要存在于农村,现代化部门主要存在于城市。<sup>①</sup>本文以Lewis(1954)的思想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的二元经济演变的理论模型。根据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第一阶段,传统部门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者获得“生存工资”,此时在工业部门工作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不由他们的边际产出决定,而只是比他们在传统产业部门中的“生存工资”高出一点点,工业部门正是通过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来获得扩张的,因为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不由他们的边际产出决定,因此在第一阶段中新古典经济学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凯恩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曾试图涉及无限劳动供给的情况,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不但假设了劳动的无限供给同时还假设了资本与土地的无限供给,最终导致了在长期增长中,经济一直被过多的储蓄所困扰(Lewis,1954);第二阶段,传统产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传统产业部门中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开始上升,这一阶段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开始由他们的边际产出决定,因此传统产业部门中的劳动者收入开始上升,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继续吸收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第二阶段开始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领域。经济从第一阶段结束到第二阶段开始的节点被称为“刘易斯第一拐点”;第三阶段,传统中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继续上升,工业部门中的边际产出继续下降,最后两

个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劳动力停止流动,当两个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了之后,意味着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二元经济结构消失,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一元经济。第二阶段结束的节点被称为“刘易斯第二拐点”。需要说明的是,Lewis(1954)只是用逻辑推理与图表的方式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阐述,并未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严格的说明,而且也并未涉及二元经济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本文用数学建模与演算推导的方式将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数理化并拓展性地加入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的内容。

我们假设第一阶段传统产业的每个劳动者的工资相等为 $w_0$ 。工业部门提供的工资为 $w_0 + \xi_0$ , $\xi_0$ 是一个接近0的正数,并且在二元经济第一阶段始终恒定不变。在这种差异工资下,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移到工业部门。假设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_C(K_C, L_C)$ 。传统产业的生产函数为 $Y_N(L_N, K_N)$ 。其中 $K_C$ 表示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 $L_C$ 表示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数量, $L_N$ 表示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数量。 $K_N$ 表示传统产业部门的资本数量,在这一阶段传统产业部门是没有资本积累的,因为这一阶段农民的收入只够维持生存,几乎没有储蓄,因此资本基本不会增加。这一阶段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的特性,因为从一开始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与劳动者数量都是有限的,为了使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较典型的新古典性质,我们假设:在区间 $(0, +\infty)$ 上 $Y'_C > 0$ ,  $\lim_{L_C \rightarrow 0^+} (Y'_C) = +\infty$ ,  $\lim_{L_C \rightarrow +\infty} (Y'_C) = 0$ 并且在 $(0, +\infty)$ 上 $Y'_C$ 处处连续且光滑。在区间 $[0, +\infty]$ 上 $Y''_C < 0$ ,并且在区间 $[0, +\infty]$ 上 $Y'_C$ 处处连续且光滑。其中 $Y'_C = \frac{dY_C}{dL_C}$ ,  $Y''_C = \frac{d^2Y_C}{dL_C^2}$ 。<sup>②</sup>

这一阶段的劳动收入比重为:

$$S = \frac{w_0(L_N - L_C) + (w_0 + \xi_0)L_C}{Y_N + Y_C} = \frac{w_0L_N + \xi_0L_C}{Y_N + Y_C} \quad (1)$$

(1)式关于 $L_C$ 求导:  $\frac{dS}{dL_C} =$

$$\frac{\xi_0(Y_N + Y_C) - (w_0L_N + \xi_0L_C) Y'_C}{(Y_N + Y_C)^2} \quad (2) \textcircled{3}$$

从(2)式看出  $\frac{dS}{dL_C}$  的符号和右边分子的符号相同。令

$$\Psi(L_C) = \xi_0Y_N + \xi_0Y_C - w_0L_NY'_C - \xi_0L_C Y'_C \quad (3)$$

对(3)式左右两边再关于  $L_C$  求导:

$$\Psi'(L_C) = -w_0L_NY''_C - \xi_0L_C Y''_C \quad (4)$$

因为  $Y'_C < 0$ , 所以  $\Psi'(L_C) > 0$ , 所以  $\Psi(L_C)$  是增函数。因为  $0 < L_C < +\infty$ , 所以  $\Psi(L_C) < \Psi(+\infty)$ 。当  $L_C \rightarrow +\infty$  时(3)式中的  $\xi_0Y_N = 0$ ,  $\xi_0Y_C$  为某一个有界正数,  $-w_0L_NY'_C \rightarrow 0$ , 所以  $\Psi(L_C) < 0$ 。因为  $\frac{dS}{dL_C}$  的符号与  $\Psi(L_C)$  的

符号相同, 因此  $\frac{dS}{dL_C} < 0$ 。因此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随着劳动要素从传统产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 全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将会持续下降。

当第一阶段末尾时传统产业部门剩余的劳动力转移殆尽, 迎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二元经济进入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传统产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并且由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决定。与第一阶段一样, 第二阶段工业部门的工资由工业部门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决定, 随着劳动力的继续进入,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继续发

$$\frac{dS}{dL_C} = \frac{[Y'_C(L_2 + L_C) + Y'_C - Y'_N(L_1 - L_C) - Y'_N](Y_C + Y_N) - [Y'_C(L_2 + L_C) + Y'_N(L_1 - L_C)](Y_C - Y_N)}{(Y_C + Y_N)^2}$$

由于上式分母大于0, 因此  $\frac{dS}{dL_C}$  的符号与分子的符号相同。令

$$\Phi = [Y'_C(L_2 + L_C) + Y'_C - Y'_N(L_1 - L_C) - Y'_N](Y_C + Y_N) - [Y'_C(L_2 + L_C) + Y'_N(L_1 - L_C)](Y_C - Y_N)$$

当  $L_C = 0$  时

$$\Phi(L_C) = (Y'_C L_2 - Y'_N L_1)(Y_C + Y_N) + Y'_C(Y_C + Y_N) - (Y'_C)^2 L_2$$

可以证明此时  $(Y'_C L_2 - Y'_N L_1)(Y_C + Y_N) > 0$  (6)

$Y'_C(Y_C + Y_N) - (Y'_C)^2 L_2 = Y'_C Y_C - (Y'_C)^2 L_2 + Y'_C Y_N$ , 因为  $Y'_C > 0$ , 所以  $Y'_C Y_N > 0$ 。令  $\Theta(L) = Y'_C(L) - Y'_C(L)L$ 。<sup>⑤</sup>因为  $Y'_C < 0$ , 所以  $\frac{d\Theta}{dL} > 0$ , 所

挥作用, 劳动的边际产出逐渐下降, 导致了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下降, 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部门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始终高于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的边际产出, 最终当传统产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工业部门的工资时, 劳动力的转移停止, 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由于第二阶段两部门工资的决定方式与第一阶段不同, 因此较好地研究方法是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划分开来研究。第二阶段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_C(K_C, L_2 + L_C)$ 。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_N(K_N, L_1 - L_C)$ 。 $L_C$  表示第二阶段开始之后传统产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与第一阶段无异, 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已经发生变化, 此时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下的生产函数,  $Y_N(K_N, L_1 - L_C)$  处处连续且光滑。这一阶段产量随着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  $Y'_C > 0$ ,  $Y'_N > 0$ , 当  $0 \leq L_C < L^*$  时都有  $Y'_C > Y'_N$ , 当  $L_C = L^*$  时  $Y'_C = Y'_N$  并且  $L_2 + L^* > L_1 - L^*$ 。在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传统产业部门的产量不受劳动力变动的影

响, 因此当  $L_C = 0$  时  $Y'_N = 0$ 。由于两部门的边际产量递减, 因此  $Y'_C < 0$ ,  $Y''_N < 0$ 。<sup>④</sup>

这一阶段的劳动收入比重的表达式为:

$$S = \frac{Y'_C(L_2 + L_C) + Y'_N(L_1 - L_C)}{Y_C + Y_N} \quad (5)$$

(5)式两边关于  $L_C$  求得:

以  $Y'_C(L) - Y'_C(L)L$  是关于  $L$  的增函数, 所以  $Y'_C(L_2) - Y'_C(L_2)L_2 > Y'_C(0) - \lim_{L_2 \rightarrow 0} Y'_C(L_2)L_2$

当  $L = 0$  时, 运用洛必达法则 (L'Hospital Rule):

$$\lim_{L_2 \rightarrow 0} Y'_C(L_2)L_2 = \lim_{L_2 \rightarrow 0} \frac{Y'_C}{\frac{1}{L_2}} = \lim_{L_2 \rightarrow 0} \frac{Y'_C}{-\left(\frac{1}{L_2}\right)^2} = 0$$

又因为  $Y'_C(0) = 0$ , 所以  $Y'_C(L_2) - Y'_C(L_2)L_2 > 0$ 。所以

$$Y'_C(Y_C + Y_N) - (Y'_C)^2 L_2 > 0 \quad (7)$$

根据(6)式与(7)式, 我们证明了, 当  $L_C = 0$  时  $\Phi(L_C) > 0$

当  $L_C = L^*$  时  $\Phi(L_C) =$

$$[Y'_C(L_2 + L^*) - Y'_N(L_1 - L^*)](Y_C + Y_N)$$

由于  $L_1 - L^* < L_2 + L^*$ , 又因为  $Y'$  是减函数, 所以  $Y'_N > Y'_C$ , 又因为  $Y'_N < 0, Y'_C < 0$ , 所以有  $[Y'_C(L_2 + L^*) - Y'_N(L_1 - L^*)](Y_C + Y_N) < 0$ 。

从上述的证明, 我们知道, 当  $L_C = 0$  时  $\Phi(L_C) > 0$ , 当  $L_C = L^*$  时  $\Phi(L_C) < 0$ 。根据介值定理在  $(0, L^*)$  内, 必定存在一点  $\xi$ , 当  $L_C = \xi$  时,  $\Phi(L_C) = 0$ , 所以  $L_C$  在  $(0, \xi)$  上  $\Phi(L_C) > 0$ , 在  $(\xi, L^*)$  上  $\Phi(L_C) < 0$ 。<sup>⑥</sup>

因此二元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规律是: 在第二阶段的初期劳动收入比重上升, 之后劳动收入比重开始下降, 上升和下降中间有可能存在一系列的波动(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为了叙述的严谨性此处还是要加以说明), 总的说来二元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大致呈现一个 n 型变动。如图 1 所示: 横轴表示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 纵轴表示劳动收入比重, 二元经济第一阶段劳动收入比重持续下降, A 点代表“刘易斯第一拐点”, 过了 A 点之后进入二元经济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呈现 n 型, 先上升后下降, 到达 B 点之后两部门的工资相等劳动力停止转移, 之后劳动收入比重趋于平稳, B 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

## 二、基于跨国比较的实证分析

由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必然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别, 因此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进行分组研究。以往的实证研究中通常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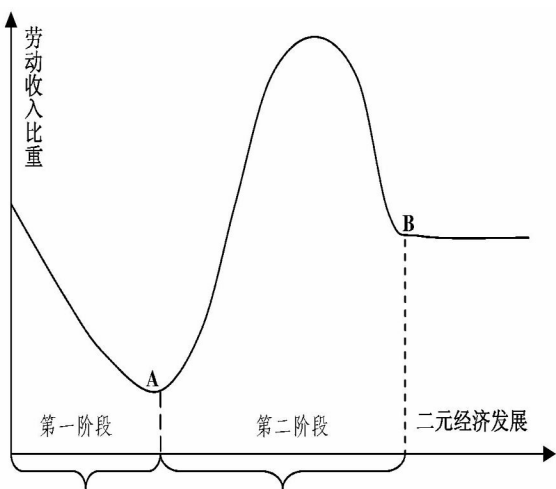


图1 二元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比重变动

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分为“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但是往往又只是根据人均 GDP 或者人均 GNI 作为这三类国家的划分依据, 但是所谓的发达国家主要应该包括四方面的衡量: 人均 GDP、高工业技术、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社会福利。因此是否为发达国家还是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单单只是看人均 GDP, 但是上述四个标准在实际的衡量过程中往往又存在着诸多争议。<sup>⑦</sup>可见, 何为“发达国家”何为“发展中国家”并无一个统一的定论, 由于本文的研究只着眼于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一个不容易引起争议的办法是按照人均 GNI 将各个国家分组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这样的分类方法参照的是世界银行 2010 年的分类标准, 由于某些国家的一些变量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并未给出, 因此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统计口径的一致(如果从其他渠道获得这些国家的缺失数据或者根据计算补充缺失数据容易造成与源数据库数据口径不一致), 本文选取 52 个国家, 约 3 万个观察值进行跨国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实证模型如下:

$$LLS_{it} = \alpha_{i0} + \alpha_{i1}LAG_{it} + \alpha_{i3}CONTROL_{it} + u_{it}$$

其中  $LLS$  代表各国每一时期取自然对数的劳动收入比重数据,  $LAG$  是各国二元经济发展指标,  $CONTROL$  代表其他影响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控制变量。

###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本文选取的“高收入国家”为 OECD 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sup>⑧</sup>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的年份为 1977-2007 年的数据。“中高收入国家”具体选取 12 个国家 1990-2007 年的数据: 阿根廷、白俄罗斯、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委内瑞拉。“中低收入国家”具体选取 15 个国家 1990-2007 年的数据: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喀麦隆、中国、印度、科特迪瓦、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蒙古、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突尼斯、乌克兰。

劳动收入比重数据: 用各国历年的劳动者报

酬数据除以历年各国的实际 GDP 数据得到。各国历年的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于联合国数据库,得到的数据为用各国货币衡量的名义数据,然后用各国的物价水平平减成实际数据,物价水平数据来源于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中心研制的数据库 PWT6.3(Penn World Table),最后用各国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换算成以美元衡量的实际报酬,实际汇率数据来源于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实际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取其中的用美元衡量的实际 GDP 数据以 2000 年为不变价。

二元经济发展指标数据:本文用各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比重来衡量各国二元经济发展的程度。具体计算方式是用传统产业部门就业人口除以各国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控制变量:由于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作用时必须剔除其他变量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选取控制变量如下。(1) 根据 Guscina(2006)、Jayadev(2007)、Ortegay 和 Rodriguez(2001)的研究结论发现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比重会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贸易开放度作为其中一个控制变量。由于用实际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作为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标准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混淆了事前和事后的开放,二是这样的贸易开放指标与收入和国家规模有内在的联系(Rao,1998)。因此本文采用 Jayadev(2007)的方法用贸易税收占贸易额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衡量对贸易的限制,避免了混淆事前与事后开放的问题,并且也可以剔除国家规模的影响。贸易税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各国货币衡量的贸易税收数据再乘以实际汇率换算成以美元衡量的贸易税收。实际汇率来源于 IMF 数据库。(2) 根据 Decreuse 和 Maarek(2007)的研究结论,我们选取 FDI 的占比作为其中一个控制变量。但是由于用 FDI 的流量数据在实证检验时会产生内生性问题(Harrison,2002),因此本文用 FDI 存量占各年 GDP 的比重作为 FDI 的占比,具体是用以美元为不变价衡量的 FDI 净流量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累加,得到各国 FDI 的

存量数据,再除以历年的 GDP 数据,得到历年 FDI 占 GDP 的比例。FDI 的流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3) 根据 Harrison(2002)的研究结论:资本市场的开放会使得资本流动性增强从而使资本在与劳动在分配社会产品的谈判中话语权增强,最终资本市场的开放将降低劳动收入比重。因此我们引入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将其作为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IMF 每年发布的《汇率安排与汇率管制年报》里面有详细的各种衡量资本管制的内容,如果某个项目存在资本管制我们就设这个项目的值为 1,如果这个项目没有资本管制,我们就设这个项目的值为 0,然后将五个项目的值相加,得到一个衡量各国资本管制强度的综合性指数,该年资本完全没有管制的国家该综合指数等于 0,该年资本完全管制的国家该综合指数等于 5。(4) 根据黄先海、徐圣(2009)的研究结论将人均资本存量与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人均资本存量数据利用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各国每年的资本存量数据,然后将资本存量数据除以每年的劳动者数量,得到人均资本存量数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来源于 IMF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劳动者数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的测算根据黄先海、徐圣(2009)的结论及公式,利用计算所得的各年劳动收入比重数据与人均资本存量数据,计算得到。(5) 由于 James(1956)与 Harrison(2002)均发现政府支出对劳动收入比重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引入政府支出比重作为其中一个控制变量,采用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及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该数据库由世界银行提供。(6) 根据罗长远、张军(2009)的研究结论,将罗长远、张军(2009)中实证检验显著影响劳动收入比重的民营化、人力资本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利用私人部门的企业注册率作为民营化程度的指标,私人部门的企业注册率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及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该数据库由世界银行提供。用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来衡量人力资本,等于高等学校的入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 (二)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先采用 ADF、KPSS、ERS 检验对三类国家 11 个变量的原序列与差分序列分别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发现 11 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再利用基于 Engle-Granger 的 Kao 检验发现三类国家的各序列存在面板数据的协整性可以建立协整模型。最后利用 F 检验排除了联合回归模型与个体均值修正回归模型并确定存在个体固定效应。因此对三类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均应该建立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平稳性检验结果涉及 66 行数据,篇幅所限不能给出,需要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索取,表 1 与表 2 分别简要给出了 Kao 检验与 F 检验结果。<sup>⑨</sup>

表 1 三类国家面板协整性检验

高收入国家				
检验方法	检验假设	统计量名	统计量值	P 值
Kao 检验	H0: 不存在协整关系	ADF	-4.398345	0.0000
中高收入国家				
Kao 检验	H0: 不存在协整关系	ADF	-9.566310	0.0000
中低收入国家				
Kao 检验	H0: 不存在协整关系	ADF	-3.688230	0.0001

表 2 模型形式的检验

高收入国家				
原假设	统计量名	统计量值	5%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检验结果
联合回归模型	F( 264 ,475)	7.3868	1.193	拒绝原假设
个体均值修正回归模型	F( 240 ,475)	5.2127	1.199	拒绝原假设
个体固定效应不存在	F( 25 ,475)	3.6731	1.529	拒绝原假设
中高收入国家				
联合回归模型	F( 121 ,84)	19.2018	1.4018	拒绝原假设
个体均值修正回归模型	F( 110 ,84)	8.0173	1.4018	拒绝原假设
个体固定效应不存在	F( 12 ,84)	4.7802	1.8693	拒绝原假设
中低收入国家				
联合回归模型	F( 154 ,105)	21.0032	1.3503	拒绝原假设
个体均值修正回归模型	F( 140 ,105)	12.1678	1.3570	拒绝原假设
个体固定效应不存在	F( 15 ,105)	9.1271	1.7627	拒绝原假设

为消除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采用截面成员的类似不相关回归(SUR),用估计的截面成员的残差协方差矩阵作为加权矩阵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表 3 显示的是三类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影响系数的测度,括号内报告 t 检验值。

从结果看出,除了希腊以外,高收入国家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比例与劳动收入比重,要么显著正相关,要么不显著。由于本文用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比例来衡量各国的二元经济状况,因此这一结果的另一层含义为,高收入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或者将降低劳动收入比重或者对劳动收入比重无显著影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高收入国家大多已完成了传统产业部门剩余的劳动力转移,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基本已经恒定,而且像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虽然传统产业产出量大,但是传统产业部门已经高度机械化,因此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变动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已经不明显。这也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在二元经济第二阶段发展的后期,传统产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将会降低劳动收入比重,但是在二元经济末期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比重影响逐渐消失。

中高收入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方向差异性较大,阿根廷、巴西、哈萨克斯坦、南非这 4 个国家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比例与劳动收入比重负相关,而白俄罗斯、哥伦比亚、俄罗斯、委内瑞拉这 4 个国家传统产业部门就业比例与劳动收入比重正相关,其余 4 个国家结

构转型效应不显著。这是由于中高收入国家大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一些国家处于第二阶段的后期,即将完成传统产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如工业基础较好的白俄罗斯。这些国家传统产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比较

少,传统产业部门具备了较高的机械化程度,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继续流失反而不利于全国的劳动收入比重,从理论模型结论也知道,第二阶段的后期传统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将会降低劳动收入比重。但是还有一些国家仍处于第二阶段的前

表 3 三类国家经济转型的劳动收入比重效应的测度

高收入国家	LAG 系数	中高收入国家	LAG 系数	中低收入国家	LAG 系数
澳大利亚	2.732 <sup>***</sup> ( 7.3138)	阿根廷	-1.013 <sup>***</sup> ( -5.0812)	亚美尼亚	2.356 <sup>**</sup> ( 3.5843)
奥地利	-0.817( -1.0772)	白俄罗斯	0.817 <sup>*</sup> ( 1.7781)	阿塞拜疆	4.817 <sup>*</sup> ( 2.0123)
比利时	1.212 <sup>*</sup> ( 1.8582)	智利	1.212( 0.0131)	玻利维亚	7.135 <sup>**</sup> ( 2.6313)
加拿大	1.422 <sup>**</sup> ( 2.2177)	巴西	-2.263 <sup>***</sup> ( -6.1061)	喀麦隆	8.147 <sup>***</sup> ( 11.3213)
丹麦	2.128 <sup>***</sup> ( 6.6721)	哥伦比亚	2.128 <sup>***</sup> ( 6.6721)	中国	3.412 <sup>*</sup> ( 2.0767)
芬兰	1.012 <sup>*</sup> ( 1.9941)	哈萨克斯坦	-1.012 <sup>***</sup> ( -9.0127)	科特迪瓦	6.325 <sup>***</sup> ( 10.3421)
法国	1.544 <sup>**</sup> ( 2.4910)	拉脱维亚	2.721( 1.5320)	埃及	2.721 <sup>***</sup> ( 12.5703)
德国	1.731( 1.2901)	波兰	3.1071( 1.4007)	印度	3.2352 <sup>*</sup> ( 2.2431)
希腊	-1.845 <sup>***</sup> ( -7.5727)	罗马尼亚	0.037( 1.0411)	伊朗	-0.037 <sup>***</sup> ( 7.3022)
匈牙利	2.421( 1.1342)	俄罗斯	3.164 <sup>*</sup> ( 1.7967)	蒙古	5.164 <sup>***</sup> ( 10.2318)
冰岛	3.117( 1.0302)	南非	-5.579 <sup>***</sup> ( -11.6732)	巴布亚新几内亚	5.579 <sup>**</sup> ( 4.0147)
爱尔兰	0.182( 0.8732)	委内瑞拉	0.873 <sup>*</sup> ( 1.9016)	菲律宾	2.125 <sup>*</sup> ( 2.0317)
意大利	1.324( 1.0125)			斯里兰卡	5.139 <sup>***</sup> ( 4.8892)
日本	0.887 <sup>*</sup> ( 1.7247)			突尼斯	3.321 <sup>***</sup> ( 9.2427)
韩国	1.442( 1.1577)			乌克兰	3.293 <sup>**</sup> ( 3.6281)
卢森堡	0.556( 0.7723)				
荷兰	0.879( 1.8872)				
新西兰	1.066( 0.5326)				
挪威	1.983 <sup>**</sup> ( 2.5166)				
葡萄牙	-0.926( -0.8662)				
西班牙	0.369 <sup>*</sup> ( 1.8662)				
瑞典	0.021( 0.2212)				
瑞士	-3.212( -1.3632)				
英国	0.674( 0.066)				
美国	1.013 <sup>***</sup> ( 3.0623)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中期,例如南非,城乡二元经济仍然较为明显。这些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型效应是正的。

除了伊朗外,所有中低收入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与劳动收入比重正相关,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是负的,这是因为中低收入国家处于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没到来。根据此前的理论研究,第一阶段传统产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将引起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表现在统计学上就是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与劳动收入比重正相关。

###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建立两部门的理论模型,将二元经济的发展以刘易斯第一拐点为分界分成两个阶段,分别考察了不同阶段下传统部门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二元经济的初期随着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劳动收入比重趋于下降。当经济体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随着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收入比重趋于上升,但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中后期,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效应又重新变为负,因此整个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随着传统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劳动收入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n型曲线”。

本文还利用5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各个国家按收入水平分成三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征:高收入国家传统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减小将会降低劳动收入比重或者对其影响不显著;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较为复杂,某些工业基础较好的国家例如白俄罗斯,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比重继续下降会降低这类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而另一些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如南非,传统产业的比重下降将带来劳动收入比重的上升。除了伊朗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传统产业比重下降均会降低这些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

以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目前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有其客观必然性。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以农业部门为主的传统产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较大份额,工业部门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

人们的收入结构仍以传统产业的收入为主要来源,因此随着传统产业的萎缩,随之一起萎缩的是以传统产业收入为主的劳动者收入。但是根据本文的结论,这一过程将会在第二产业充分发展之后得到改变,因为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结构中工业部门的收入也开始占据较大的比重。等到后工业化时期,知识经济与服务产业占据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人们的收入结构调整不及经济结构调整速度,因此劳动者的收入会再次降低,直到产业结构升级完全完成之后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将趋于稳定。因此,根据经济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担心目前的劳动收入下降的问题,只需善加引导,使得原先固化在传统产业内部的劳动力逐渐消解,逐渐转移至工业部门,提高工业部门收入在人们日常工资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由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力流失,为了满足社会对传统产业商品的需求就有必要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只有提高传统产业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才能解决劳动力流失与产量增加的矛盾,并且提高“留守”在传统产业中的劳动者收入。

#### 注释:

①之所以说传统部门不只是包括农业部门,是因为这个部门中还包括其他一些个体,如一些临时工、个体小摊贩、旅店餐馆的服务生,等等。

②在现实经济中 $L_c$ 的范围达不到正无穷,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现实经济中 $L_c$ 的范围只是我们假设条件中的一个真子集。

③其中 $Y_c = \frac{dY_c}{dL_c}$ 。  $Y_N + Y_C$ 关于 $L_c$ 求导之所以等于 $Y_c$ 是因为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边际产量很低,虽然有劳动力从传统产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但是传统产业部门的总产出不会有任何下降。

④同时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我们假设第二阶段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是相同的,事实上这样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二元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并不会太大的差别,这相比于著名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假设不同国家的生产技术相同显然要更宽容一些。

⑤此处 $L$ 代表函数的自变量。

⑥考虑到 $\Phi(L_c)$ 可能存在多个零点的情况,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结论不算完美,以眼前所有的条件证



明零点的唯一性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  $L_c = 0$  的某个领域内  $\frac{dS}{dL_c}$  都是大于 0 的,在  $L_c = L^*$  的某个领域内  $\frac{dS}{dL_c}$  都是小于 0 的,换句话说,在二元经济第二阶段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劳动收入比重都是上升的,在第二阶段要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劳动收入比重都是下降的,因此即使真的存在多个零点,这导致  $\frac{dS}{dL_c}$  的正负交替变化完全可以看做是中期劳动收入比重的一系列波动,丝毫不会改变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最终规律。再者,以一般经验判断劳动收入比重作为一个宏观实体经济变量与虚拟经济变量那样出现频繁震荡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⑦例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用历年世界发达国家八大类发展指标的数据进行计算,最后得出的平均值定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科学院现代化报告课题组却认为,如果第二次现代化评价的综合指数能够达到世界各国的平均值就可以视之为中等发达国家。

⑧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虽为 OECD 成员国也属于高收入国家之列,但 1993 年才独立,样本数据偏少,因此本文的样本中不包括这两个国家。智利 2010 年才正式加入 OECD 并且其收入水平不属于高收入国家,因此将其排除,除此之外,墨西哥、波兰虽属 OECD 成员国,但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不属于高收入国家。

⑨由于涉及到较多的变量与检验过程,篇幅所限,具体的检验结果不再罗列。

#### 参考文献:

- 1.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3 期。
- 2.范从来、张中锦《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过程中的结构优化问题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 年第 1 期。
- 3.方军雄《劳动收入比重,真的一致下降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发现》,《管理世界》2011 年第 7 期。
- 4.黄先海、徐圣(2009):《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2009 年第 7 期。
- 5.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6.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2009 年第 5 期。

7.翁杰、周礼《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研究:1997-2008 年》,《中国人口科学》2010 年第 4 期。

8.翁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 年第 6 期。

9.Bai, Chong-En and Zhenjie Qian,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1978-2007",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 21(4), 650-670.

10.Decreuse B, Maarek P.,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Aix - Marseilles II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07.

11.Guscina, A.,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IMF Working Papers, 2006, No. 294.

12.Harrison, Ann E.,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 UC Berkeley and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13.James W. B., "Labor's Share and the Degree of Utilization of Capacit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56, 22(4), 457-467.

14.Jayadev, Arjun,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and the Labour Share of Incom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31(3), 423-443.

15.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177-222.

16.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2), 139-191.

17.Rao, J. M., "Globalization and the Fiscal Autonomy of the Stat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Background Papers, 1998, 1, 327 - 360.

18.Solow, Robert M., "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elative Shar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4), 618-631.

19.Young, Andrew T., "One of the Things We Know that ain't So: Is US Labor's Share Relatively Stabl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0, 32(1), 90-102.

责任编辑 董希望

## ABSTRACTS

### Adam Smith on "Wealth" and "Justice" in Commercial Society (4)

Kang Zixing

(*Law School , Beiha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191 ,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wealth and justice is a core issue for commercial society. In order to govern wealth properly and justly , it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commercial society. In the discourse on "the causes and nature of wealth" , Adam Smith demonstrates the natural base of labor division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of sympathy , and searches the natural scale of value according to the sympathy mechanism with "labor" as the core. The discussion of Adam Smith on justice brings a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thoughts , the founda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rather commutative justice than a certain regime. As long as the trade process and the trade order are just , the resulting social structure is just and free. Adam Smith's approaches not only make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society gain legitimacy on jurisprudence , but also make political economics be a part of legislator science.

**Key words:** Adam Smith; commercial society; wealth , justice; natural law

### Optimal Desig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 Ratio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13)

Zhao Yue<sup>1</sup> , Guo Guixia<sup>2</sup>

(*1.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2.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Beijing 100029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pervision form and scale of the optimal capital adequacy ratio when there i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bank and the regulator , and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the leverage ratio supervision proposed in Basel Accord III on bank behaviors. The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risk-weighted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n Basel Accord II is no longer the optimal capital supervision mode when there i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bank and the regulator , the addition of leverage ratio supervision is contribute to increase social welfare , and the optimal level of leverage ratio is determined by the parameters such as the supervision capability of the regulator ,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 economic states , the benefit of bank project , etc.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a new regulatory tool , that is , an incentive compatible risk-weighted capital adequacy ratio. The regulator can adjust the current risk weight and make it accords with bank incentive compatible requirements by the mechanism design to encourage the bank to veritably report the risk type and enhance social welfare.

**Key word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leverage ratio; risk-weighted;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and the Fluctuation of Labor Share (24)

Xu Sheng<sup>1</sup> , Huang Xianhai<sup>2</sup>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angzhou 310023 ,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labor force migration in traditional sectors on the labor share are divided by "the first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the second Lewis turning point". At the first stage of dual economy ,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labor share , while at the second stage of dual economy ,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has the n-shape curve effect on the labor share , that is , the labor share firstly rises , then declines. On the basis of this , the paper makes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different states and district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 by using 30 000 transnational panel data of 52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bor migration effect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is close to zero , the situation in upper-middle-class countries is complicated , and the effect in low-mid-

dle-income countries is negative.

**Key words:** dual economy transformation; labor migration effect; labor share

**Why Are Companies Eager to Establish Political Connections?**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 33)

Yu Wei<sup>1</sup>, Yu Chengsen<sup>2</sup>, Wang Miaojun<sup>3</sup>

( 1. *School of Finan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Zhejiang Hangzhou Drilling Machine Manufactory Co., Ltd, Hangzhou 310016,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a global government business phenomen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tudies on political conne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connection, firm value and the mechanism for political rent, as well as the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connection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se, it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provides some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es, and discuss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researches for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 political rent; firm value; firm performance

**Effectiv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ment Credibil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Emergencies: A New Analysis Framework**

( 40)

He Ziyang, Chen Lijun, Li Canhui

(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curren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ccelerating, the accumulated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exposed d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ve resulted in each kind of public emergencies occur frequently. The lesson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to respond to and deal with public emergencies suggest that effectiv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and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solving public emergencies well.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relational model an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ffectiv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nd its credibility with the entry point of public emergencies, namely, builds a relational model with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s the mediated variable and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 proposes five dimensions (timeliness, accuracy, transparency, participation, responsivenes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 deal with public emergencies well, and furthermore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is about effectiv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contributes to improve the public trust on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credibility.

**Key words:** public emergency; effectiv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relational model

**From Unit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to Regional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e Generating Logic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Regional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 47)

Tang Wenyu

(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of CCP,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Unit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is a closed and administrative mode of CCP's grassroot party construction. It serves the artificial planned "mechanical solidarity" of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and tallies with the special social formation of "unit socie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ransition of "unit society" has resulted in the inadaptation of unit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causes the bad phenomena of "discretization" and "suspension" of CCP's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brings about the non-ignorable political risks and social risks, so that the inner demand of transforming unit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to regional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is engendered. Regional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is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mode of CCP's grassroot party construction. It serves the "organic solidarity" of new society and is the product of CCP adapting the external new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regional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is to overcome the systematic risks brought by the inadaptation of unit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unit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regional mode of party construction; generating logic; theoretical connotation